

从语境模型到译者模型

——一个探究译者如何决定译文的质的研究案例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摘要: 翻译并非是文本之间直接的语码转换,而是译者发挥主观作用的过程。基于此认识,本研究进一步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探究。研究方法为质的研究,以研究者(即译者)为研究工具,研究对象为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费尔克劳著作《语言与全球化》中文译本的产生过程。通过反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考虑的与翻译相关的因素以及作出决定的动因,归纳出影响译者翻译的一些因素,并参照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社会-认知研究方法的倡导者范代克关于语境模型的论述提出译者模型的概念,以期对译者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作出解释。

关键词: 学术翻译; 质的研究; 译者模型; 批评话语分析; 语境模型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65X(2019)5-0014-11

一、引言

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已是翻译学界的共识,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关于翻译即是改写(如 Lefevere, 2005)、译者行为批评(周领顺, 2014a, 2014b)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如许钧, 2003; 陈大亮, 2005)等问题的探索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作用,也都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了译者发挥作用的方式。近年来对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的研究(如贾燕芹, 2016)也发现莫言小说中那些具有重复、罗列特征的修饰语在译文中得到删减、简化和整合,而这种改写式的翻译在冯全功(2019)看来则体现出译者对原文政治话

收稿日期: 2019-08-15; 修回日期: 2019-09-02

作者简介: 田海龙,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翻译研究

语实施的干预。更有学者（如尹佳，2017）指出，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体现在对原文的意义理解、对译文的语言表达以及对原文意义的再建构三个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选择表达形式、创造知识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主动性（田海龙，2017a, b）。译者对于哪些部分需要调换，哪些部分需要强调，必须在翻译过程中作出及时的选择和决定（Tymoczko & Gentzler, 2007: xxx）。然而，译者依据什么在翻译过程中作出这些选择和决定？这个选择和决定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本文论述的质的研究案例试图对此作一回答，以期探究译者为何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原文。

二、社会实践与语境模型

之所以在认同译者具有翻译的主观能动作用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探究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是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理论原则。首先，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 1992），在这一社会实践中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交流对象的关系、所在场合正式程度、所依托的机构是否具有权威以及表达意义的价值取向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句式、语体或者模式来传递信息，参与活动，建构身份，再现事实（田海龙，2009）。将这一批评话语分析的理念投射到翻译研究上面就会认识到译者也需要依据与其相关的社会因素、受教育程度、所设定的读者群、翻译的口笔译形式、资助翻译的机构特征和译者自己追求的价值取向等诸多社会因素选择译入语中特定的词汇、句式、语体来完成翻译任务，实现从事翻译活动所要达到的诸如传递信息和文化交流的目的，或者是通过翻译实现译者的一些抱负，如要体现自己对原文的一种理解，重新建构起一种意境或事实等。这样翻译就不是一种与译者无关的从原文本到译入文本之间直接的语码转换，而是译者参与社会实践，体现其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实现其推广和宣传目标的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个译者深度融入的翻译过程中，翻译所体现的语码转换过程是复杂多变的，译者需要决定选择目的语中的语言形式，而这种选择即是一种社会实践，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田海龙（2017a）认为，翻译如同话语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在这种社会实践中译者需要依据其社会认知的程度选择译文参与社会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探究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理论基础。

其次，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范代克（van Dijk, 2012）曾用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的概念阐释人们在交流过程中说这句话而不是那句话的原因。例如，在分析英国下院的一场辩论时范代克（ibid.: 276-282）指出，布莱尔在演说中使用特定的指称代词（如 *this House, Mr. Speaker* 等）表明他明白辩论发生的场景，还使用特定的语句（如 *we should be proud, that is a fantastic thing* 等）将过去的一些具有争议的

活动赋予正面的含义,表明他谙熟对手反对的议题以及双方共享的价值规范。语境模型的概念表明布莱尔演讲中的遣词造句都是他对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作出实时判断和决定之后的选择。将范代克解释社会主体选择使用语言方式从事社会实践的语境模型投射到对译者选择译入语表达方式从事翻译实践的研究当中,可以看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决定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原文中的一句话或一个词,不仅仅是语言层面斟酌的结果,而是经过充分的思考之后的决定,这其中涉及的思考对象既多种多样,又具体相关,体现出动态变化和因文而异的特征。在语境模型的概念框架内,可以影响交际活动的语境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情景,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人而异的主观建构体。换言之,交际活动的参与者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知识对与交际相关的各种因素作出的理解和判断决定着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句式参与交际活动(van Dijk, 2008)。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考虑的与翻译实践相关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动态变化的,只有那些与译者社会认知密切相关的因素才会对译者的选择起到决定作用,而哪些因素相关,如何相关,则完全取决于译者的社会认知。在这个意义上,语境模型的概念在解释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说话的同时,也为阐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原文提供了理论借鉴。

除了以上两个具体的理论原则之外,批评话语分析所具有的一些普遍理论原则也在宏观层面为探究译者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内在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例如,批评话语分析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质疑,将研究的重点从语言本体扩展到包含社会活动者在内的各种与语言使用相关的社会因素(田海龙,2006),这对翻译研究将译者及与翻译相关的社会因素纳入研究的视野提供了理论依据。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话语与社会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由中介体间接构成的,并在探索这个中介体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同的研究路径(田海龙,2016),这也为翻译研究探索原文本与译入语文本之间如何间接地联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符号和话语的意义可以由社会主体赋予,因而意义依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的兴趣和利益而定,权力贯穿于话语实践的全过程,并决定符号和话语具有这个而非那个意义(田海龙,2015)。这一认识对在翻译研究中抛弃那种此译文优于彼译文的观念,确立译文源自译者的社会认知,因而是因译者而异,因各种社会因素而定的动态变化特征具有意义。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些(包括其他一些)理论原则对探究译者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原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这些理论原则也体现在质的研究方法上面。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陈向明(2000:12)定义的质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即“以研究者个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况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

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构建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质的研究建立在后实证主义，特别是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基础之上，是对科学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因此与量的研究所依据的实证主义理论传统不同，而且也与定性研究不同，尽管二者的英文都是 *qualitative research*。根据陈向明（2000：21-24）的阐释，质的研究对真理的唯一性和客观性进行质疑，而不像定性研究那样以寻找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本质为目的。质的研究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构建研究的结果或理论，强调研究的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而定性研究则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只是采用一种形而上的思辨方式，发挥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强调研究的结论性、抽象性和概括性。

田海龙（2013）从质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范式及其发展脉络出发总结出一些质的研究特征，其中以下两点对本研究至关重要。第一点是在自然的情景中进行研究，并以研究者作为工具。就本研究而言，研究者即是译者本身，他曾经长期从事英语语言的学习和研究，具有丰富的阅读经历，对该研究中涉及的原文本中的专业知识有充分的了解，能够在自然的翻译过程中反思和发现研究问题，并注重研究问题的相关性和具体性。因此，在本研究中以译者为研究工具所得出的研究成果与以统计软件为研究工具得出研究结果不同，它不是可以证实普遍情况的客观数据，而是译者对所经历的选择和决定译文这一翻译过程的解释性理解。在这一理解的生成过程中，译者的个人经验、研究倾向以及与研究对象的密切联系和反复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研究成果的生成。第二点是采用归纳的分析方法构建小理论。就本研究而言，译者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断收集相关的研究素材，在与他人的讨论中不断提炼出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问题，通过对所收集素材进行分类和归纳，寻找概念和主题，并提炼出小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注重对微观和具体问题的描述，通过自下而上对素材的归纳分析提出具有解释性的译者模型理论。这个小理论不具有普遍真理的特征，但具有独特的地域性特点，可以解释具体和相关的研究问题。

本研究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是译者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这个问题产生于译者在 2018-2019 年间翻译《语言与全球化》（Fairclough, 2006）这本书的过程中。这是一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学术著作，该书作者从批评话语分析与文化政治经济学结合的超学科视角审视语言与全球化问题，指出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实际发生的全球化，而且是一个通过话语建构的全球化。因此，实际发生的全球化是一回事，如何再现这个全球化过程则是另一回事。作者认为，话语对全球化过程的再现可以反映这个过程，也可以建构这个过程，使其向着某个预定的方向发展，在这个建构过程中社会主体的话语策略发挥了巨大作用。费尔克劳的这些观点在阐释社会实践主体通过话语策略来导致话语变化进而实现社会变革方面较以往单纯的提出话语的

变化导致社会变革的论述更为深入(田海龙, 2010)。正如费尔克劳(Fairclough, 2006: 11)的隐喻所示, 话语变化产生的新话语就像新设计出来的引擎只有被物质化之后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引擎一样, 也只有被操作并变成其他物质的东西才可能成为实际生活中的社会变革。

这部学术著作译者不止一次阅读, 还写过一篇书评(田海龙, 2010), 对其内容比较熟悉。在将这部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 尽管需要更为仔细的研读, 但总体上并未在理解和表达方面感到困难, 直到出版社的责任编辑^①在审读译文时提出一些翻译方面的问题与译者商榷, 才真正反思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

四、术语翻译及相关讨论

这本书的中文译本提交给出版社之后, 责任编辑非常认真地审读了译稿, 并就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与译者进行了商榷和讨论。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术语翻译方面, 其中的一个术语是 mediation。责任编辑曾经质疑为什么 mediation 这个词翻译成“媒介”, 他建议在下面这段原文中将其译成“报道”。

(1) These are complex questions which I don't presume to answer here. But the example I shall discuss, the mediation of the events of 11 September 2001 (see Edwards and Martin 2004), is of interest with respect to globalization in several ways. (Fairclough, 2006: 113)

译文: 这些复杂问题我不想在这里深究。但我将讨论的案例, 2001年9月11日事件(参见 Edwards and Martin 2004)的媒介问题, 就全球化来说在很多方面是很有趣的。

编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 译者并没有对该术语的汉译有过多的思考。在批评话语分析的文献中, mediation (媒介) 是一个具有特别含义的学术术语, 指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 而是由中间体间接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状况。这个中间体也是批评话语分析所致力于探索的问题 (Jorgensen & Phillips, 2002: 69-70)。责任编辑之所以建议 mediation 在这段文字中译成“报道”, 主要是考虑行文的通顺和易于读者理解。在仔细考虑编辑的建议之后, 译者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译法, 主要是觉得翻译成“报道”虽然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 但是这部著作的学术性也将随着术语的消失而被弱化。

另一个商榷的术语是 mediatization, 在译稿中翻译成“媒体化”, 如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译成“政治的媒体化”。编辑提出应该译成“政治的媒介化”, 并建议译者在网上查一下, 网上论文里这个术语很多, 之后又说这两种译法都有。在译者作了简单的解释之后, 责任编辑指出:“第五章开头的几个术语您是这样译的, mediation 媒介, mediated 媒介的, unmediated 非经媒介的。根据这几个词的翻译规

律, *mediatize* 就应该是‘媒介化’啊……*mediation* 和 *mediatization* 是一类派生词、同词根, 为何前者是‘媒介’, 后者是‘媒体化’, 而不是‘媒介化’?”

编辑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这几个词确实都源自 *media* 这个词, 它在译稿中翻译成“媒体”, 如“新闻媒体”。之所以翻译成“媒体”, 是因为这个词具体指那些报道新闻的不同媒体, 如电视、报纸、互联网等。然而在 *media* 前后加上词缀生成 *mediated* 和 *unmediated* 这两个词, 用以表达间接的这样一种特定的含义, 则形成术语。例如, *mediated life* 翻译成“媒介的生活”, 表明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并非都是直接经历的, 许多事情都是经第三方间接经历的; 而 *unmediated life* 翻译成“非经媒介的生活”, 则表明排除第三方(即没有中间体作媒介)而亲身经历的生活。费尔克劳在《语言与全球化》这本书中讨论“经由媒介的生活”就是要强调在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媒体以及媒体每天产出的大量话语充斥着人们的生活, 同时也干预和引导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使人们的生活呈现出经由媒介的特征(Fairclough, 2006)。与 *mediated* 和 *unmediated* 这两个术语源自词根的抽象意义(媒介)不同, *mediatization* 这个词可以被认为源自词根的具体意义(媒体), 所以翻译成“媒体化”。所谓具体意义, 最直接和简单的解释就是这种意义是可以触摸的。因此, *mediatization* 这个术语也体现出其他领域跨入媒体领域这种随处可见的现象, 如政治的媒体化体现出政治活动需要通过媒体来实现, 或曰媒体成为政治活动的场所。就术语翻译而言, 所依据的不能是其词汇意义, 而是译者对其在相关文献中的专业含义的全面系统理解。

尽管可以沿着责任编辑的思路, 从词根的角度认识如此翻译这几个学术术语的原因, 但是认真反思与责任编辑的讨论, 也认识到真正下决心坚持这样翻译的底气不是来自构词结构的解读, 而是来自对这几个术语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特定含义的理解。这几个词既然是学术术语, 就不能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翻译, 而是要依据它们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特定的(甚至是比较狭窄的)含义来翻译。

事实上, 对责编提出的关于术语翻译的商榷意见并非都有如此十足的底气坚持己见。例如, *cognitive cartography* 在译稿中译作“认知地图学”, 责任编辑建议改为“认知图绘”, 译者就不假思索地同意了。但是为什么以上几个术语的翻译一定要坚持己见呢? 以下是对这个问题的反思。

五、关于术语翻译的反思

经过与责任编辑讨论, 对这部学术著作中术语的翻译进行反思, 发现头脑里一直有这样一种认识, 即《语言与全球化》是一部学术著作, 译著也应体现其学术著作的特征。这一认识不仅影响着术语的翻译, 也体现在译文中句式的选择上面。例如:

(2)Chouliaraki's framework allows us to investigate such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resources that are devoted to reporting distant suffering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affecting different people. (Fairclough, 2006: 113)

原译：朱莉亚姬的框架能够通过观察那些报道不同地区、影响不同人群远方痛苦的再现手段方面研究这些差异。

改译：朱莉亚姬的框架能够通过观察再现资源来研究这些区别，这些再现资源用于报道不同地区，影响不同人群的远方痛苦。

最初将其译成一个完整的句子，这和原文句式是一样的。但是编辑认为这样的译文读起来比较拗口，建议分成两个小句。然而，翻译成两个小句虽然读起来中间可以有个停顿，但是其中“用于报道不同地区、影响不同人群的远方痛苦”与“再现资源”的修饰关系却被弱化了。虽然翻译成完整的句子显得句式比较长，读起来比较费劲，但这毕竟是学术著作，需要用心仔细阅读，费劲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基于这些考虑还是坚持译成了一个完整的、复杂的、比较长的句子。这种坚持引发的对责编的歉疚直到后来读到孙周兴（2013）关于学术翻译的硬译原则才有所释然。他认为：“哲学-思想类的译文就要‘蓄意地’做得‘硬梆梆’的，让一般的人看不懂——因为原著本身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接近的。”（孙周兴，2013）

学术著作翻译出来就要像学术著作，而不能像科普读物或者通俗读物，因此，有学者（孙秋云、黄健，2014）称学术著作的翻译是研究型翻译，是对原作者学术思想的再研究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学术术语的翻译自然要体现出译者对这些术语的专业性理解，还要体现出译者对译入语相关学术语境的理解，进而使原著中的学术思想顺利融入新的译入语的学术语境。译者在翻译《语言与全球化》这部学术著作时所坚持的看似是某一术语如何翻译，实际上是翻译的学术性以及译者对于如何体现学术性的特殊理解。此乃反思形成的一个领悟。

在翻译这部学术著作中的术语时，译者试图体现自身对这些术语的理解，从而发现译者的专业知识以其形成的相对于编辑而言的权威性理解决定着术语的翻译。人文学科的学术术语在源语语境中的理解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复杂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作者可能会用同一术语表达不同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同学术背景的读者对同一术语有不同的解读。这样的术语在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时候，其复杂和多变的程度则更为明显，而且当下人文社科领域日益凸显跨学科特征，术语翻译更难以把握（朱蕾，2016）。面对这种状况，在单一学科框架内追求术语的统一译名并非上策（刘亚猛，2004），相反，译者关于学术著作的专业知识则更显得重要，而这种知识也构建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权威。反思《语言与全球化》这部学术著作的术语翻译，译者的知识和权威体现在对特定术语的独特理解上面，

而责任编辑所注重的则是更为普遍接受的译法，甚至是已有的译法。编辑更多的是从网络上搜索现有的译法，即使是要求规范翻译的建议，规范的依据也主要是来自网络，而不是专业的解读。可见决定某个术语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的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而是带有个性理解特征的知识。孰对孰错已不是决定采用某个特定译法的标尺，专业的知识和个性的理解才是定海神针。此乃第二个领悟。

反思引发的第三个领悟是翻译的主观性。一直以来翻译实践以产生好的译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好的译作的标准则以忠实于原文为第一标尺。就《语言与全球化》这部学术著作中的术语翻译而言，译者对原著的忠实实际上是对原著理解之后的忠实，是译者依据自己的知识体系对原著中术语理解之后的忠实。这是一种经过译者过滤的忠实，它和译者所认为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一样，如果不是译者被赋予翻译这部学术著作的机会，都无法具体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译者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学术著作中的术语也是一种权力运作的结果。尽管在学术翻译中应该避免“译者话语权力和知识权威的滥用”（郭庆民，2017），但是译者的知识权威在翻译过程中是存在的，它不仅赋予译者以翻译的权力，而且赋予翻译过程与所产生的译作以主观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六、译者模型：一个可能的解释？

在翻译《语言与全球化》中的一些术语过程中，译者注重的是学术和专业，这虽具有主观的倾向，但建立在知识之上的权力也赋予其一定的正当性。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不妨参照语境模型的概念加以解释。

范代克在探究人们在具体的交际语境选择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表达自己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语境模型的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源自社会心理学家解释人们在不同环境中采取这样而非那样行动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概念（van Dijk, 2008）。将心智模型的概念投射到人际交流的研究当中，范代克提出了语境模型的概念（Tian, 2011）。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将语境模型的概念投射到对译者翻译作用的研究上面，进而提出译者模型的概念，解释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什么选择这样而非那样的语言形式翻译原文。正像语境模型强调交际参与者依据自己的知识对交际语境进行判断进而选择交际方式一样，译者模型所强调的并不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因素对译者选择词汇和句式具有直接影响，相反这些因素是通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其的认识、定义、理解甚至是建构来间接地实现其对翻译的影响。就以上翻译案例而言，译者将某个术语翻译成这样而不是那样，不论是因为注重译著的学术性还是凸显译著的专业性，都是在译者模型的框架下通过译者对与该术语翻译相关的一些因素进行实时理解、判断之后作出的决定。哪些因素与翻译相关，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译者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呢？借助译者模型的概念从以上翻译案

例中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一些认识。

比较明显的一个因素是译者对原著的认识和定位。这方面有很多因素可以考虑,如原著的学术思想、写作风格、语言特征等。这些因素如果能够体现在译著当中,那一定是因为译者将其视为与翻译活动极为相关。就像在日常交往中人们无法用一句话表达所有的关切一样,译者也无法把所有相关的因素考虑周全。在责任编辑反复强调要以准确和流畅为目标时,译者选择了学术性为首要目标,体现出译者模型的一个特征,即译者所考虑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换言之,是那些译者认为与翻译最为相关的因素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实践。

另一个因素是译者对译著读者的认识和定位。如果将读者视作非专业人员,译文可能会更为通俗,句式也会简短一些,在适当的地方会作一些调整,如编辑所建议的那样,进行加译或减译。但如果将译著的读者定义为这个领域里非常专业的学者或学生,译文就会比较专业,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就会感觉这样的术语翻译不接地气,无形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责任编辑从读者的角度当然希望译著通俗易懂,而译者从专业的角度希望学术性强一些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也体现出译者模型的一个特征,即译者所考虑的因素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换言之,是那些译者认为与翻译有着最密切联系的读者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实践。

除此之外译者还会考虑翻译的目的。通常翻译的目的有传达意义、传播文化、介绍信息、欣赏作品等(周领顺,2008)。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翻译除了介绍和传播的目的以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学术研究(陈才俊,2006)。这是因为术语翻译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商榷性,需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刘亚猛,2004)。就以上翻译案例而言,译者之所以坚持将 *media* 译成“媒体”,*mediated* 译成“媒介的”,*unmediated* 译成“非经媒介的”,*mediation* 译成“媒介”,*mediatization* 译成“媒体化”,也是将学术翻译视作学术研究,在译入语中建立一套相关的术语体系。这套汉语的术语体系可以和以往的译法不同,但一定要有特点,要自成体系。既然翻译是一种话语实践,译者所要达到的目的就不仅是传递学术思想,还要包括在译文中体现译者对原著学术思想的理解,并且构建译者的学术身份。这样在译者模型框架内,译者考虑的因素便具有目的性,可以说是那些译者认为可以实现翻译目的的因素影响着译者的翻译实践。

七、结语

在以上研究案例中译者也是研究者。通过反思特定学术术语的翻译过程,归纳这样而非那样翻译这些术语的影响因素,在借鉴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社会认知路径的语境模型概念基础上提出译者模型的概念,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进行解释。译者模型的概念并不是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以译者为中心,而是力求

认识译者理性分析能力在翻译过程中的实现方式。此框架下质的研究案例凸显学术翻译也是学术研究这一命题，表明译者这样而不是那样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译者通过翻译参与社会实践。这种向内探究译者思考过程的微观案例研究与论述学术翻译原则的宏大叙事形成对照，对于译者在学术翻译中如何发挥作用，进行选择 and 创造的自由载量在社会文化因素作用下的扩大幅度、社会及读者反应与译者裁量之间以及通俗考量与专业考量之间的矛盾等诸多具体问题都可以形成更为深入和清晰的认识。

注释：

- ① 本文所指的责任编辑或编辑并非指某个具体的人，也未必与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该书中文版中可能注明的责任编辑相同，尽管这些商榷和讨论确实存在。

参考文献：

- [1]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2]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 [3] Jørgensen, M. & L. Phillips. 2002. *Discourse Analysis as Theory and Method*[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4] Lefevere, A. 2005.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5] Tian, Hailong. 2011. Joint Review of van Dijk's *Discourse and Context* and *Society and Discourse*[J]. *Language in Society*, (1): 116-121.
- [6] Tymoczko, M. & E. Gentzler. 2007. *Translation and Powe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7] van Dijk, T. 2008.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 van Dijk, T. 2012. Critical Context Studies[A]. In Tian Hailong & Zhao Peng (ed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Essential Readings*[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9] 陈才俊. 2006. 学术著作翻译原则[J]. *学术研究*, (9): 130-134.
- [10] 陈大亮. 2005. 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 *中国翻译*, (2): 3-9.
- [11] 陈向明. 2000.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 [12] 贾燕芹. 2016. 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3] 冯全功. 2019. 基于文本超越文本——《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评介

- [J]. 中国比较文学, (3): 206-209.
- [14] 郭庆民. 2017. 从批评话语的核心概念看英汉学术翻译[J]. 国外理论动态, (3): 116-125.
- [15] 刘亚猛. 2004. 风物常宜放眼量: 西方学术文化与中西学术翻译[J]. 中国翻译, (6): 44-48.
- [16] 孙秋云, 黄健. 2014. 当前学术翻译的若干问题及其新机遇[J]. 书业, (2): 26-30.
- [17] 孙周兴. 2013. 学术翻译的几个原则——以海德格尔著作之汉译为例[J]. 中国翻译, (4): 70-73.
- [18] 田海龙. 2006.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 40-47.
- [19]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M].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 田海龙. 2010. 《语言与全球化》评介[J]. 当代语言学, (1): 68-70.
- [21] 田海龙. 2013. 趋于质的研究的批评话语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4): 6-10.
- [22] 田海龙. 2015. 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社会符号学视角[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6): 1-7.
- [23] 田海龙. 2016. 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 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6): 3-9.
- [24] 田海龙. 2017a. 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J]. 外语研究, (3): 60-71.
- [25] 田海龙. 2017b. 中央文献英译的话语研究范式——超学科视角[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5): 1-7.
- [26] 许钧. 2003.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 (4): 290-295.
- [27] 尹佳. 2017. 解读、协商、与建构——外宣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能动作用[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5): 15-20.
- [28] 朱蕾. 2016. 术语翻译中的约定俗成与动态商榷——以中文版《话语与社会变迁》为例[J]. 话语研究论丛, (3): 67-81.
- [29] 周领顺. 2008. 学术翻译研究与批评论纲[J]. 外语研究, (1): 78-84.
- [30] 周领顺. 2014a. 译者行为批评: 理论框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31] 周领顺. 2014b. 译者行为批评: 路径探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 于 涛)

本期主要学术论文英文题目及摘要

From Context Model to Translator Model: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of Translator's Decision on the Translated Text

TIAN Hai-long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s direct transition of code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but a process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plays his rol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translator plays his role in the actual translation of Fariclough's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The research method is qualitative, while the researcher (the translator in this case) is the research tool. Reflecting on his translation of certain technical terms, the translator summarizes certain factors he considers relevant for his decision. The paper proposes, based on van Dijk's context model, a translator model, to explain the way the translator translates the book.

Key words: academic transl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translator mode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ontext model

Th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Norms Studies

CHEN Yong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eight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ranslation norms and their studies are controlled by power relations and ideology, historical, interpretative, mediated, and socially constitutive as a social practice. These features are further discussed in terms of some key notions of postmodernism, and five postmodernist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lation norms (studies) are identified, namely, diversity and instability, indeterminacy, mediation, relation, and criticality. This approach can help with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norms and their studies.

Key words: translation norms; postmodernism; discours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Study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ood Structure in Chinese Political Speech

LIU Chun-mei

Abstract: With the interpersonal function of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political speech *Be Trustworthy Friends and Sincere Partners Forever i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 discuss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mood structure in Chinese political speech. It finds that the subjects in mood structure are altered, the value of modal verbs is reduced, and some modal adjuncts are transformed into tense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discourse, the translator enjoys a more flexible choice to transl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od structure than from that of content.